



中华

历代文学

观止

周成华◎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 汉朝文学观止

《中华历代文学观止》是为广大学子和青少年编写的一

套表现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丛书，丛书按时间跨度分成6册。

本册主要向读者们介绍从刘邦建汉到魏晋时期的名家和作

品。包括作家生平 and 主要作品的介绍，并且选择了一些具有

代表性的作品赏析，是广大文学爱好者业余读书生活的佳品。





# 汉朝文学观止

中华

历代文学

观止

周成华◎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华历代文学观止》是为广大学子和青少年编写的一

套表现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丛书，丛书按时间跨度分成6册。

本册主要向读者们介绍从刘邦建汉到魏晋时期的名家和作

品，包括作家生平 and 主要作品的介绍，并且选择了一些具有

代表性的作品赏析，是广大文学爱好者业余读书生活的佳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朝文学观止/周成华主编.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9

(中华历代文学观止)

ISBN 978 - 7 - 5601 - 6423 - 6

I. ①汉… II. ①周…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史—中国—汉代 IV. ①I20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7232 号

书 名:汉朝文学观止

作 者:周成华 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王世林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30 字数:500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6423 - 6

封面设计:揽胜视觉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2010 年 10 月 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 - 88499826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mailto:jlup@mail.jlu.edu.cn)



## 绪 论

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秦朝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 一、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

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作家的出现,产生了一批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命寄托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文人。文坛在经历了秦代和汉初的沉寂之后,到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作家群体再度生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生不已,人才辈出。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因此,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事实上,汉代士人的阅读范围并不限于五经,而是广泛得多,尤其是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西汉时期,解读楚辞是一种专门学问。汉赋和楚辞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种新文体确立之后,也和楚辞一样成为士人贵族的诵读物,汉宣帝时还有过这样的事情:王褒等人用诵读奇文及自己作品的方法为宣帝的太子、亦即后来的元帝治病解闷,其中的奇文当有楚辞类作品。这种精神疗法效果



明显,不但太子得以康复,而且经他倡导在后宫形成了诵读王褒赋的风气。到了东汉时期,人们诵读辞赋的兴趣依然很浓,就连贵族妇女也主动参与,出现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的专门著作。诵读辞赋在汉代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是士人文化素养的标志。虽然诵读辞赋者并未都成为辞赋作家,但汉代许多人确实是从诵读辞赋开始而顺理成章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扬雄少而好学,他诵读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赋,并且加以摹拟,他本人也成了汉代重要的作家。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他还创作诗赋等作品多篇。汉代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汉代的文人也以辞赋家居多。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两汉选拔人才注重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并不是他们经通行修,而是在于他们的文才。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制度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却起到了推动作用。汉代不仅中央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

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职。因擅长文章辞赋而被录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扬雄等。有些人虽然不是靠文学创作才能而进入仕途,但是,他们成为朝廷命官之后,在天子的倡导下也加入了辞赋创作的行列。自武帝起,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东汉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辞赋,但是,兴起于西汉的进献辞赋之风依然在东汉延续,基本上保持了它的连贯性,许多文人就是因文才出众而倍受青睐。

东汉政权长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东汉许多著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

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汉代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荟萃之处,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

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西汉早期,文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武帝朝至东汉初期,游宦之风稍衰。东汉中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成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

## 二、汉代文学的基本趋势

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在史传文学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经济文化等面面俱到,远至黄帝,近至当世,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类人物纷至沓来。就是篇幅有限的郊祀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虽然从西汉末年开,谨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是主要潮流。汉代文人积极的人世精神,好高尚义、轻死重气的品格,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并产生了许多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作品。

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汉代文学在表现士人的进取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士人的命运还和所处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对于古代士人来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

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魄的感慨。在抒发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时,汉代文学也显示出历史上升期的特点。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幽怨和不满,但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文人所感慨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西汉昌盛时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

西汉朝廷是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短暂的楚汉相争而建立起来的。批判秦朝的暴政,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汉初文学的重要内容。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到司马迁的《史记》,都贯穿着对历史的批判精神。从武帝开始,思想界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系的构筑,与此相应,文学也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从东汉开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从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到郦炎、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精神日益强烈。批判的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汉代文学以历史的批判发轫,经由昌盛期的歌功颂德,最后又以现实的批判而告终,完成了一次循环。不过,和前期的历史批判相比,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

和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汉初的枚乘、庄忌、邹阳等人游食诸侯间,为大国上宾,他们来去自由,具有独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纵横家的品性。从武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迎合天子的口味而创作。东汉时期被外戚招纳的幕僚文人,有时也要牺牲自己的人格为主人唱赞歌,他们和宫廷侍从文人一样,都是不自由的。这些依附于天子、外戚的作家,多数是文人兼学者的类型,王褒、扬雄、刘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此。从西汉末年起,向慕人格独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队伍中萌生,扬雄、班固、张衡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摆脱侍从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从事创作。东汉后期的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从他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人的影子。从汉初出处从容、高视阔步于诸侯王之间的枚乘、邹阳等人,到汉末赵壹、祢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汉代文人在经历了一段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且达到更高的层次。

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人神同游、人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进入东汉以后,文学作品的浪漫



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把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和班固、张衡的同类作品相比,把《史记》和《汉书》相比,都可以看到浪漫和现实的差异。当然,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并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文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至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政论,在东汉也问世了。

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两汉时期存在采诗制度,通过采集民间歌谣用以充实乐府的乐章,有时也用来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风民俗。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这种新的诗歌样式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地加以模仿,于是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乐府诗中也有文人的作品。民间五言诗在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又日益走向成熟。除诗歌外,汉代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史记》、《吴越春秋》都把许多民间传说写入书中,增加了这两部作品的传奇色彩。

### 三、文学与经学的互动

西汉的学校教育是在武帝时期经公孙弘倡导蓬勃发展起来的,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学,郡国置五经率史。成帝时太学弟子 3000 人,东汉后期太学生多达 30000 人。除官办学校外,遍布于各地的私学也大量招收生员。汉代经学教育为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并不期待就学人员成为作家,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却具备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主要是通过他们得以实现的。

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无论是辞赋、诗歌还是散文,也不管是出自文人之手还是乐府民歌,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从而形成汉代文学的唯美之潮。汉代文学对现实的一切都怀着极大兴趣去描绘、去表现,而且漫无节制地铺陈扩展。进行罗列时不忌堆砌,不避重复,描写叙述过程中靡丽夸饰、多冗衍之辞,许多作品因此显得笨拙、呆板。和汉代文学铺张扬厉风气相映成趣的是汉代经学的繁琐解读习尚,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二三万字。汉代文学和经学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都是不厌其繁,多多益善,铺天盖地而来。这使得某些文学作品篇幅过长,如同辞典字书,令人不能卒读;经学也因其过于细碎繁琐、牵强附会而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许多文人不但摹拟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时代的文人也相互模仿。这种摹拟有题材方面的,也有文体方面的,甚至具体的谋篇布局也多有

雷同之处。流行于汉代的大赋、骚体赋、七体、九体、设辞等,都留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汉代文人在摹拟他人作品过程中也有创新,但在整体格局上的因循守旧是显而易见的。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强调传授先师之言。不依先师之言而断以己意,就会被视为轻侮道术,受到学界的谴责。汉代经学的传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情性,使人受到很大束缚。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本质是相同的。只有那些在经学上不守章句、不拘师法家法的博通之士,在文学创作上才真正有所建树;汉代有创造力的文人,确实也都突破了经学传授上陈陈相因的传统。

从总体上看,汉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作为大汉天声的辞赋,从东汉中期起,大赋呈现衰微趋势,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正统的史传文学作品也出现由繁到简的趋势。把《汉书》和《史记》相比,班固删去了司马迁许多精彩细致的叙述和描写,篇幅大为减少。从文学样式上看,短小精练的五言诗从附庸变为大国,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霸主地位。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似,从东汉初期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为的是便于传授。有的是一删再删,解经文字大幅度精减,是对以往烦琐之风的有力矫正。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思潮也有很深的影响,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的藩篱,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许多作家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重身份。《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毛诗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色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对汉赋的评价,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各家的褒贬毁誉不同,但都是从经学的基点上立论,以经论屈骚,以经论汉赋,在这点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即使像王充那样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评论各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也经常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汉代文学思潮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这就是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提出的“发愤著书”说,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压抑以后的情怀爆发。但是,在经学风气弥漫的汉代,司马迁的这种文学理论难以得到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击。

#### 四、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

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拟屈原的《离骚》、《九章》,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西汉刘向曾编集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人摹拟之作,署名《楚辞》。其中被收录作品的汉代作家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又附加了自己的《九思》。除此之外,扬雄、冯衍、蔡邕、赵壹等人也有楚辞体作品传世。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许多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因此,许多楚辞类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其例。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则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至于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以主客问答形式构制的设辞类作品,在风格上和赋相近,后人往往把它归入赋类。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都有这类作品流传下来。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钜制,《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西汉时期,七言句子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汉代辞赋中往往参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落,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后来曹丕的《燕歌行》采用的就是这种诗体。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七发》那样为汉赋体制奠定基础的作品。汉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歌广为传播,并且用于宫廷祭祀,成为庙堂之曲。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定于一尊。因此,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

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坛的模拟风气日趋严重。王充的《论衡》却以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 五、魏晋文学发展状况

从汉末大乱到隋代统一,历时约四百年。我国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历史情况复杂,文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

东汉后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剧烈,宦官、外戚两个集团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倾轧,更造成了政治的极端黑暗和腐败,再加上对羌族的连年用兵和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黄巾大起义,给东汉反动统治以严重的打击。起义虽被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东汉帝国也已名存实亡。从献帝初平元年(190)开始,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扩张了军事力量的豪强军阀,纷纷拥兵割据,在长期混战中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繁盛的中原地区竟出现了“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

在割据的军阀中,曹操对现实具有较清醒的认识,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他抑制豪强兼并,禁止豪民转嫁租赋于农民,并广兴屯田,用军事组织把广大流民重新安置到土地上,并且广泛搜罗“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因而,发展了生产,壮大了力量,逐



步统一了北方。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汉,而分据东南、西南地区的孙权、刘备也相继称号建国,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面。

汉末社会的巨大变动也引起社会思想的变化。汉代自武帝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独尊的统治地位。这时,适应新的现实的需要,名、法、兵、纵横等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界呈现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建安文学有了崭新的面貌。建安文学以魏国为主。吴、蜀很少作家与创作。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围绕他们聚集了“七子”、蔡琰等众多的作家。这些作家大都倾向于曹操的缓和阶级矛盾以迅速恢复封建秩序的政策,思想上有进步的一面。他们又都曾卷入汉末动乱的漩涡,接触了较广泛的社会现实,因此能够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他们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辞赋和散文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汉代那种铺张堆砌的大赋消沉了,篇幅短小具有浓厚诗意的抒情小赋有了较大的发展。散文则趋于自由通脱,无论抒情、叙事或议论都显得生动活泼。

建安时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更高的评价,加之汉末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所有这些也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建安时期,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采取了压抑豪强的政策。当农民起义的风暴过去时,曹魏统治者为了取得豪门的支持,便极力团结他们。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表现了在用人方面对大官僚豪强地主妥协的倾向。到了魏正始时代,曹魏统治集团已完全发展成为新的贵族大地主,政治日趋腐败;旧的豪门地主势力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代表这种势力的司马氏在逐渐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之后,便和曹魏统治者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司马氏一方面通过收买、拉拢树立自己的党羽;一方面以残酷的屠杀消灭曹魏集团的力量,造成了魏国后期即正始以后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

汉末清议之士,因批评政治招致了党锢之祸。接着魏代汉,晋谋代魏,又大肆屠杀政治上的异己人物。在这种政治局面下,清议逐渐转为清谈,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并注老子,兴起了玄学,道家思想更为风行。这对当时的士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都有深刻

的影响。

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是上述现实的产物。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看到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他们的创作也与建安文学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内容为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忧生之嗟”所代替。积极的进取精神为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作品中带有更多老庄思想的色彩。不过,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

司马氏与曹魏争夺政权的斗争以司马氏的胜利而结束。公元二六五年,司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不久,并统一了全国。为了稳定统治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如招集流亡、罢州郡兵、劝课农桑等,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太康年间的繁荣。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西晋王朝是代表士族大地主利益的腐朽政权,在它的统治下,各种现实矛盾迅速加剧。太康元年,继废除曹魏屯田制之后,颁布了占田制,把官僚地主的经济特权制度化了,士族可以依据官品合法地占有大量的土地。同时,九品中正制也日益发展成为保障士族政治特权的工具,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严重情况。这样,便确立了反动的门阀制度。士族依靠这些制度垄断了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特权,加深了阶级鸿沟,也造成了寒门与世族的尖锐矛盾。司马氏为了巩固一姓统治,又大封同姓,诸侯王都拥有武装。晋武帝死后,诸王争权夺利,演成“八王之乱”,前后达十六年之久,中原地区又一次遭到兵燹的浩劫;国力也大为削弱,西北匈奴鲜卑等酋帅见有机可乘,纷纷入侵,西晋王朝就在内乱外患相继发生下覆亡了。我国又进入了南北长期分裂的时代。

公元三一七年,司马睿依靠南北士族的联合支持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它是西晋腐朽的士族特权政治的继续,各种现实矛盾继续发展。士族的经济力量更加膨胀,他们不断地兼并土地,成为惊人的大地主,如刁协一家就占田万顷。门阀制度也发展到了顶点,士族公然编订“百家谱”,并不与“杂类”通婚,士、庶的界限越来越严格,地位相差越来越悬殊。士族阶级占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过着苟安享乐的生活。他们不仅无意于收复北方失地,甚至由于种种自私的目的害怕收复失地,对爱国志士祖逖等人的坚决北伐行动也横加阻挠,使之无法成功。而内部则不断争权夺利,皇室、军阀和掌握实权的大士族之间常常爆发尖锐的冲突。东晋一代,从王敦起兵到桓玄篡位,不断发生内战,政局动荡不安。

尽管东晋保有的江南地区比混战的北方安定,北方人口的大量南徙又带来了进步的生产技术,南方经济较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腐朽的士族统治下,人民并没有获

得经济发展的利益。赋税徭役不断加重。如东晋初亩税三升,后改为口税三斛,又激增为五石。繁重的剥削促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东晋末年以孙恩为首的江南诸郡人民大起义,给东晋政权以毁灭性的打击。在镇压起义中兴起的刘裕,于公元四二〇年代晋自立,东晋便灭亡了。

两晋是士族制度社会,士族是一个非常腐朽的阶级。他们一味追求享乐,不敢正视充满尖锐矛盾的现实,只是依靠门第,把持高官,却又要“不以物务婴心”。在这种情况下,清谈玄理的风气更为兴盛。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点缀风雅,炫耀才华,掩饰精神的空虚。

在两晋玄学的发展中,由于阶级关系的复杂,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玄学家表现了不同的政治观点。郭象发展了何晏、王弼的儒道调和思想,主张自然与名教合一说,目的在于论证士族统治的一切现行制度都是合理的,是士族阶级利益的代表。鲍敬言则发展了阮籍、嵇康的思想,创“无君论”,认为“君臣既立,众愚日滋”,只有“无君无臣”的“曩古之世”,人民才有富足安宁的生活。这是反映了小私有者的幻想与要求。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正是和这种思想相通的。

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重要现象。佛教由东汉开始输入,经历三国时代,到两晋时期更为兴盛,佛寺日渐增多,佛经大量翻译出来。不过,在玄学盛行的情况下,士族偏重于佛教义理的研究,他们吸收了佛学中的唯心主义哲学,把玄学推到了更高的阶段。汉末开始创立的道教,原来主要在民间流行,这时也产生了贵族道教,出现了葛洪这样的教徒,在士族阶层中影响愈来愈大。天师道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两晋时期,垄断了政治和经济的士族阶级也垄断了文化。在他们的把持下,文学离开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很少反映社会现实,主要成了表现士族阶级狭隘思想感情和不健康艺术趣味的工具。为了掩盖内容的空虚,他们刻意追求形式的华美,把文学推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晋初诗人傅玄、张华已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但一部分乐府诗还不失汉乐府遗意。到了太康时期,社会的表面繁荣使士族文人更加无视现实,一味歌功颂德,形式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的创作,不是机械地拟古,毫无新意;便是内容贫乏,只追求词藻的华缛和对偶的工整。但是,西晋社会的现实矛盾也促使少数诗人面向现实,写出了内容较充实的诗篇。出身寒微的太康诗人左思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抨击了腐朽的门阀制度。在西晋末年尖锐的民族矛盾中成为爱国志士的刘琨,写出了有深厚的爱国感情的诗歌。郭璞的诗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内容。从西晋末年开始,由于清谈玄理风气的盛

行,“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坛渐为玄言诗所统治,其代表作家孙绰、许询等人的创作都“平典似道德论”。玄言诗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直到晋末杰出的诗人陶渊明出现,才为空虚的东晋文坛带来富有现实内容的创作。他的诗歌对腐朽的士族社会表现了极端憎恶与否定的态度,表现了他的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格和躬耕自给的生活理想。由于在田园劳动中接触了下层劳动人民,亲身体验了农村生活的贫困,后期创作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对剥削压迫,要求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提出了桃花源理想。他的诗具有平淡自然的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并能创造出很高的意境,大大提高了五言诗的艺术水平。

小说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我国自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加之道教兴起,佛教传入,而整个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生命经常受到威胁,很容易接受宗教迷信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记录灵鬼怪异的小说,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作者的主观目的虽在宣扬宗教迷信,但其中保存了一些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编造的神异故事,具有较高的人民性。魏晋时期清谈玄理、品评人物的风尚又促成了记录人物轶事小说的出现。它与志怪小说不同,是以现实的人物言行为对象。刘宋初年出现的《世说新语》是魏晋轶事小说集大成之作,它广泛地反映了由汉末至晋士族阶级的思想、生活面貌,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我国小说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粗具规模,它们标志着我国小说的一个重要阶段。

### 六、南北朝文学发展状况

从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到公元五八九年陈灭于隋,共169年,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南朝继续东晋的偏安局面,社会情况比北朝安定,在广大人民辛勤劳动下,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业产量增加,手工业发达,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活跃,并出现了许多经济繁荣的都市,如建康、京口、山阴、寿春、江陵、襄阳、成都、番禺等。史载建康“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可见一斑。

南朝个别帝王虽曾对门阀士族采取过某些限制政策,庶族寒门的力量也略有抬头,但基本上仍是两晋士族门阀社会的继续。士族地主攫取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大庄园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南朝时期,佛教有了更大的发展。东晋时,建康佛寺不到四十所,到了梁朝,则“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梁武帝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宣布“唯佛教是正道”,更确定了它的优越地位。佛教的发展不只兴起了大僧侣地主,也引起了与儒、道的矛盾,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斗争,对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南朝文学中,南朝民歌特别值得表视。它主要是产生于建业和荆州一带的《吴

歌》、《西曲》。它们以短小的形式,清新活泼的风格,表现了人民对合理的爱情生活的追求和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精神。从中也可以看到长江流域商业的发达。南朝民歌本不限于歌唱爱情,但独取情歌入乐,却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观点和趣味。

南朝的君主和诸侯王大半爱好文学,不少都以提倡文学、招揽文士著称,有的本身还是作家,写诗的风气十分浓厚。因此,文学作品大量增加。但南朝文学在帝王和贵族的掌握与引导下,只能继续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发展。

南朝文人诗歌从宋初开始由玄言转向山水。玄言诗本来就与山水有密切关系。玄言诗人常常通过山水体会玄理,而登临山水也很早就成为士族阶级优闲享乐生活的一部分。东晋末年殷仲文、谢混的诗里,山水成分已逐渐增多。到了宋谢灵运,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山水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遂完成了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山水诗仍是贵族生活的产物,但它打破了玄言诗的腐滥,反映了自然美,并多少提高了诗歌的表现技巧,仍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宋代出身寒微的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的传统精神,成为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优秀诗人。他的作品猛烈地抨击了门阀制度,并表现了士族文学所少见的爱国思想和较广泛的社会内容。他的七言和杂言乐府改进了七言诗的形式,扩大了七言诗的影响,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齐、梁时代是我国诗体发生了重要变化的时期。我国诗歌自建安以来,渐重词藻、对偶、用事,晋陆机要注意到声音的谐调,到了这时,由于声韵学的发展,周顒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接着沈约把四声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创造了“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不过,“永明体”作家的创作大都内容贫乏,形式主义作风严重,只有谢朓工于描写山水,成就较高。诗歌发展到梁、陈时代,在帝王和贵族手里,更导向了“宫体”的道路。梁简文帝萧纲、庾肩吾、庾信、徐摛、徐陵都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人。宫体诗是宫廷荒淫生活的反映,以描写女色为主,充满色情成分,诗风浮艳绮靡,标志着贵族文学的十分堕落。这一时期只有江淹、吴均、何逊、阴铿等人的创作略有成就。

诗歌而外,骈文有突出的发展。我国散文从东汉起已渐趋整饬对偶,魏晋时期更形成了骈体文。这时在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的影响下,出现了骈文的高潮。骈文几乎占有了文字领域,只在历史和其他学术著作中,散文才保有一块微小的地盘。骈文词藻华丽,对偶工整,音韵优美,有其艺术特点,也出现少数内容上有价值的作品,但就其主导方面来说,却是以华丽纤巧的形式掩盖空虚贫乏的内容,是形式主义的东西。

南朝的文学批评获得了空前的成就。魏晋时期,已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出现,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等。到了南朝,由于文学创作的繁盛,文学日益成为一个独立部门,文学观念也日趋明晰。宋文帝开始立文



学馆,与儒、玄、史三馆并列。宋范晔著史单位文苑传。这时发生的文笔之辨,更是一场关于文学界限的争论,这些无疑都对文学研究起着促进作用。加以形式主义文风的盛行,激起了一些进步文人的不满。在这样情况下,刘勰、钟嵘继承了前人文学批评的成果,创作了《文心雕龙》、《诗品》两部文学批评巨著。它们都有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倾向,同时也把文学研究推到新的阶段。《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对文体、创作、批评各方面都有系统的论述。《诗品》品评了众多诗人的成就与风格,其序言论述诗的起源和发展,颇有独到见解。这两部著作对后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晋亡后,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人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的统治者不断互相攻杀兼并,混战了一百多年,使中原经济和文化再次遭到惨重的破坏。他们用血腥的屠杀和落后的军事统治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人民生活极端痛苦,不断爆发以汉族为主体的人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各族的反动统治,促使它们逐个破灭。北魏太武帝统一了北方,结束了混战局面。孝文帝迁都洛阳,他一方面实行均田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加速了民族同化的过程,给封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北魏仍是鲜卑贵族联合汉族豪强地主的反动统治,社会矛盾不断发展,终于在六镇起义的打击下,分裂为东、西魏,后来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代替,最后为汉族杨坚建立的隋朝所统一。

北方各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半积极利用汉族的封建文化,所以推尊儒学,儒家思想占有相当的地位,与南朝的情况有别。统治者又利用佛教麻痹人民,因而佛教大盛。

北朝文学最有成就的部分是民歌。它酷似汉乐府,相当广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会现实和北方人民悲惨的命运,突出地表现了北方民族的精神面貌,并具有豪放刚健的独特风格。其中的《木兰诗》更是一首杰出的女英雄赞歌。

在长期混战中,在游牧民族落后的统治下,北朝文人创作是很消沉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文学作品几乎绝迹。北魏以后,开始出现一些作家,如温子升、邢邵、魏收等,但他们一味模仿南朝文学,缺乏特色。直到庾信由南入北,才为北朝文学打开局面。他本是南朝的宫体诗人,沦落北朝以后,作风大变,以刚健之笔写出了充满故国之思的“暮年诗赋”,并表现了南北文学融合的趋势,是成就较大的作家。

在南朝,骈文统治了文坛,北朝却出现了几部著名的散文著作。郦道元的《水经注》在描写山川景物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不只描写佛寺建筑十分精采,而且善于用简洁的文笔叙述故事,描写人物。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风格平易亲切。北方散文的发展以及苏亮、苏绰的提倡复古,都表现出北方文学与南方不完全相同的倾向。